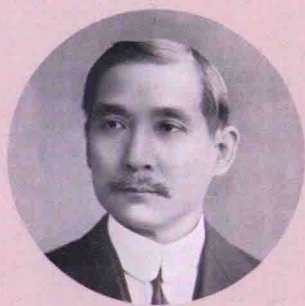


黄宇和院士系列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Y. Wong



历史侦探

从鴉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黄宇和 著

The Historian as a Detective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1911 Revolution



看到过去多久，就能看到未来多远

听历史侦探侃过去的故事，
拨开林则徐、叶名琛、洪仁玕、孙中山等与世界互动的迷雾
窥视人世间的百态，增长看未来的能力

黄宇和院士系列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Y. Wong

历史侦探

从鴉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黄宇和 著

The Historian as a Detective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1911 Revolution

by
John Y. Wong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The Historian as a Detective: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1911 Revolution
by Professor John Y. Wong, BA(HKU), DPhil(Oxon), FRHistS, FASSA, FAHA
Emerit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 黄宇和 (John Y. Wong)
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4
(黄宇和院士系列)
ISBN 978-7-218-12663-0

I. ①历…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K25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7450 号

LISHI ZHENTAN; CONG YAPIAN ZHANZHENG DAO XINHAI GEMING

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黄宇和 (John Y. Wong)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周惊涛 陈其伟 柏 峰

装帧设计：彭 力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42.5 字 数：660 千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3157 83795240 邮购：(020) 83795240

序 言

2014年6月24日，出版界的88岁老前辈、香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萧滋先生热情向本侦探建议，把几十年来博览群书、档案钻研结合实地调查与历史想象的治史方法与经验撰写成书。

兹承雅命，方式是以“本侦探”的名义现身说法，把本侦探曾运用这种四管齐下的治史方法所解决了的一些悬案，不拘大小，娓娓道来。因此本书各章节，有崭新的探案，诸如“林则徐是制毒巨枭”。有把过去本侦探已经破解了的悬案，作进一步追查。例如污蔑“叶名琛为‘六不’总督”的顺口溜，究竟元凶是谁？以及由于进一步发掘新史料而更上一层楼并予以破解了的悬案，包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英以色列‘信仰’”。

案情繁简决定了各章长短，而各章的上文下理（context），则见本侦探其他著作，尤其是《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以及行将出版的《文明交战》（暂定名）。盖本书的部分章节是取材自该三本拙著当中、短小精悍而独立性极强的片段。因此，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各章的题目分别属于两大领域：其一是有关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探案；其二是对孙中山生平具关键性事件的侦察。两次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具体事例，孙中山则是反抗帝国主义侵华的典型民族英雄。

把帝国主义压迫、民族主义反抗这两大领域再放到宏观的角度检视，则两次鸦片战争这形于外的事物，是本侦探对敛于内的帝国主义所进行

的个案研究；孙中山这形于外的人物，则是本侦探对涵于内的民族主义所进行的个案侦察。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恰似一块铜板的两面，而这块铜板就是近代史——不单是中国近代史，而且在某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近代史。本侦探追踪近代史的发展，不能偏重帝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因为如此就犹如偏听一面之词。治史必须在档案钻研、实地调查与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兼视兼听来神游冥想，借此广开言路。

至于本侦探为何选择两次鸦片战争和孙中山两大领域作为个案来探索，则完全是由于机缘巧合。事缘 1968 年本侦探从香港大学毕业后，马上前往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长期由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保存的叶名琛档案，刚刚移交给英国国家档案馆并终于开放了，本侦探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再结合英国各机关部门及各地方的英语档案，正好兼顾了中英双方的态度、处境与追求，避免了偏听。于是本侦探决定首先以叶名琛作为个案，切入帝国主义的研究。

研究愈来愈深入之后，总觉得缺少点什么。适逢 1979 年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代主任胡守为先生盛情邀请本侦探当访问学人；更由于该校的陈锡祺先生，屡屡不耻下问有关孙中山的史事和史料，故突然想到孙中山乃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暨民生主义——通称“三民主义”——是其毕生学习、思考与实践的结晶，于是本侦探决定以孙中山作为个案，借此研究民族主义。

终于，在 2015 年 6 月 26 日比原定计划提前四天完成了本书初稿共 60 章。但马上碰到两只凶猛的拦路虎。其一是“炒冷饭”之嫌。其二是哪怕当时还只有 60 章的初稿也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试想：把“独立性极强的片段”结集在一起，“队伍不整，放枪时参差不齐”^①，真是贻笑大

① 此乃孙中山之言，描述 1883 年清朝阅兵大臣方耀到香山县，在濠头乡检阅清兵时的情况。见陆文灿：《孙中山公事略》（稿本，藏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该稿后来刊登于《孙中山研究》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方！说是一本论文集也够不上。准此，唯一能同时打垮两只猛虎的武器是，为全书谱写出一首主旋律。而这首主旋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既能凝聚共识——把 60 种不同声音编织成一首既多姿多彩而又和谐悦耳的交响乐，更借此全面克服“炒冷饭”之嫌。

怎么啦？摆明白是把曾经出版过的片段再拿出来献丑，还说不是“炒冷饭”？此点正是中西治史方法的巨大分别之一。在西方，若某甲发掘出大量史料，并解读及运用此大批史料来建构出一套理论，大家热烈鼓掌。某乙运用某甲所发掘出的大量史料，加上自己所发现的新史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同一种历史现象，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大家同样热烈鼓掌。同样的，若某甲再接再厉而发掘更多新的史料，加上经过星移物换而在思考问题时更为深思熟虑，又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审视同一种历史现象，终于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推翻自己过去的结论，大家更是热烈鼓掌，因为这是人类进化的积极表现。把这种治史方法升华到思想的境界，则思想家称之为“水平思维”（lateral thinking）。即不局限于某一种思维方向，而是从不同的方向甚至反方向解读史料和思考问题。

中国史学界长期深受清朝乾嘉时代纯粹考据的治学风气所影响，结果多是致力于史料的考据。乾嘉考据诚然是一种追求朴实无华的考据学风，故又称为朴学。但缺点则在于其不注重史料的运用，遑论解读史料并借此以建构出一套符合经世致用的理论。其实，在乾嘉考据学风出现之前，明末遗民鉴于明朝的覆亡，痛定思痛之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哲学、军事各方面的思想主张，均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专制政体和宋明理学进行有力的批判。可惜清朝政权稳固以后，即大兴文字狱——顺治帝施文字狱 7 次，康熙帝施文字狱 20 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 20 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 130 多次——把华夏的文化精英吓得噤若寒蝉。谁敢建构理论并抒发己见，等待诛九族好了！君不见，清朝在所有孔庙前面的空地上都竖立一块卧着的石碑，上面刻有“士子不得议论时政”之

类的字样。违者的命运将会像该石碑一样——马上躺下来！难怪“中央研究院”某院士前辈，听了本侦探在2006年11月6日于广东省中山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当场冲口而出地说了一句话：“走火入魔！”^①

也难怪2015年5月5日，中国大陆某学术期刊把拙稿《孙文之信教与被逐》退还，理由是“内容与写法可能均与刊物风格不同”。本侦探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把该文拆分成两章收入本书，即题为“孙中山在何时何地 and 哪种情况下领洗进入基督教？”的第三十七章，和题为“为何孙中山被驱逐出教会？”的第五十一章。伫候读者诸君教正内容、写法与风格，有何不妥？

本侦探也不气馁，兴致勃勃地把拙稿转投台湾某学术期刊。2015年8月3日接审查意见说：“尊稿过半内容文字已见于阁下近年两本巨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2015.01）、《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2011.09），重复比例过高，与本刊宗旨不符，本会只得割爱，敬请原谅。”此言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审稿人的注意力全盘贯注在史料的发掘上，完全忽视史料的解读和运用以解决历史学领域有待解答的问题。

该审稿人没有理解：本侦探之所以撰写《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除了发掘有关史料这趟必须履行的手续以外，更高的学术目标是了解答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问题。又本侦探之所以撰写《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除了发掘有关史料这趟必须履行的手续以外，更高的学术目标是了解答孙中山“为何”走上革命道路的问题。至于为何《孙文之信教与被逐》之作为一个独立专题，至今还没有人运用本侦探所发掘出来的史料尝试解答，因而是一个崭新的探索项目。若本侦探

^① 详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当中，题为“救亡从教育入手”的一章。

运用自己过去发掘出来、哪怕已经收入两本拙著的资料，加上本侦探最新发现的、滴滴皆甘露的珍贵史料，试图合力解答一个前人解答不了的问题，有何不可？

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考量，就更难怪 2015 年 11 月 12 日，本侦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的“传承与创新：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 150 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拙文《孙文之信教与被逐》后，评论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朱浚源教授，冲口而出地说了一句话：“走火入魔。”

哈哈！好事成双：本侦探“走火入魔”之美名，先后刻进广东省中山市“纪念孙中山诞辰 14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的录音机，和主办“传承与创新：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 150 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台北市国父纪念馆的录音机，留存万世。

对于本侦探运用“水平思维”来解读和运用史料是可行的治史方法，容本侦探再举一个例子。本侦探的师弟、剑桥大学历史学皇家讲座教授艾文斯爵士（Professor Sir Richard Evans），大半生专攻德国史。他在 1990 年把他历来所写的书评结集成专著，书名是《重新审视德国史》^①，出版后受到西方史学界高度重视。什么？炒自己过去所写过的书评的冷饭？重复已经出版了的书评，有什么价值？竟然也会受到广泛的高度重视？关键是：艾文斯爵士借着结集其众多书评的机会，总结他那一代人研究德国史所取得的成绩和心得，指出不足之处和有待努力的地方，并建议将来研究的方向以及可能加强或纠正的史论。归根结底，他的众多书评在出版以后，已经变成史料了，他正在运用史料——哪怕是他自己所创造的史料（书评）——来宏观地开辟史论新天地。若出版社所礼聘

① Richard J.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的审稿人，只顾史料之重复而漠视史料的运用，肯定会建议出版社“割爱”！

准此，本侦探接下来的任务是：构思出一首主旋律作为本书的主心骨，借此凝聚各自为战的初稿共 60 章的精神。最后想通了：主旋律宜采当前西方世界天天隐喻地厉声高叫的“中国该打！”。

“中国该打！”？为何笔锋一下子变得如此凌厉？并采此作为本书的主旋律？因为治史之理想是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前人覆辙。因而治史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经世致用，这也是本侦探毕生奋斗的目标。

事缘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在 1993 年撰文，谓此后世界上的战争将是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①。200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似乎证明他有先见之明。而从 2012 年开始，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法国首都巴黎发动的连环枪击案，尤其是骇人听闻的 2015 年 11 月 14 日连环枪击案，更是轰动全球。

文明交战不待今时今日，其实 1000 多年以来一直在大规模地进行着。近至 19 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1 和 1856—1860）所拉开序幕的、旷日持久的百年屈辱，是显著的例子。君不见，在鸦片战争之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已经尝试过用“糖衣炮弹”来“开化”华夏。那就是 1834 年 11 月在广州外国人商行区成立的“在华传播有用知识协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该会理事会开宗明义就说：“当华夏扼杀了一切促使它与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结盟的努力之后，我们现在尝试使用智性大炮（intellectual artillery），让知识取得和平。”^②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② 见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in PRO: FO17/89。

intellect, 一般翻译做知识, 例如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毫无例外地翻译为知识产权。其实单纯的知识, 英文叫 knowledge。而 intellect 则包含比单纯知识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 余英时先生就把 intellect 翻译为“智性”, 又把 anti-intellectualism 翻译为“反智论”。并诠释说: “‘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 而是一种态度。”又说: “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 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 中国自然不是例外。”具体来说, “反智”就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①

消除华夏文化当中的“反智论”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惜“在华传播有用知识协会”的骨干成员——在穗英商和基督宗教传教士, 毫不掩饰他们正在“从事一场战争” (engage in a warfare) 来改变华夏对境外世界的认识。^② 他们试图利用知识来取得的“和平”, 是要华夏儿女服服帖帖地当其顺民。难怪他们的“智性大炮”终于发展成为鸦片战争中的实弹射击。正如历史学者希尔拉曼在其《亚洲帝国与英国知识》一书中所指出的: 该协会的骨干成员, 把过去欧洲人通过基督宗教耶稣会士的报道而对华夏文明所产生的一个“华夏爱好和平”的良好印象, 改变成为一个半野蛮的、落后闭塞的文明, 并由此而隐喻地高喊“中国该打!”之后,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可以大胆地想象对华开战的可行性了。^③

①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载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页1—2。

② 见 Michael Lazich, *C.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 Y.: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Murray A. Rubinstein, “Propagating the Democratic Gospel: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Thought in China, 1830-1848”,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11 (July 1982)。

③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04-105.

为何如此极端？该协会的所有中文刊物，都不可能对华夏文明说半句好话，因为该协会本身的生存价值是由下面这样的一个假象支撑着：中国的野蛮落后！它的处境就正如 19 世纪的基督宗教传教士一样，“若他们表达对华夏文明有丝毫值得肯定的话，就等于否定他们的传教事业有任何价值”。^① 确实非常极端、绝对！无他，他们都是战争贩子，都在竭力鼓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华夏开战啊！

又例如 1857 年年初，当英国国会激烈讨论是否要发动第二次对华开战——即后来的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就有位名叫蒙哥马利·马丁（R. Montgomery Martin）者，建议英军占领全中国。逻辑是中国乃继印度之后“不列颠文明发展的下一个广阔舞台，此乃天意安排”^②。这不是摆明白地说，19 世纪的英国精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他们要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华夏文明如火如荼的“文明交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华夏文明全线溃败。但华夏精英仍然不断地苦苦挣扎，终于在新中国成立时，把帝国主义从神州大地赶跑，结束了旷日持久的第一场“文明交战”。但由于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目前正积极联同印度文明，以及已经“脱亚入欧”150 多年的日本，与已经取消了汉字近乎 100 年的韩国和越南，共同对付华夏文明，下一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文明交战”，指日可待？

因此，日夜萦绕着本侦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若将来再度发生“文明交战”，后果会如何？过去，绝大部分国人责怪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华夏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孙中山先生则早已自我反省，并指出华夏文明确

① 见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ondon: Scarecrow Press, 1996), p. 131。

② Martin to Clarendon, 7 February 1857, FO17/279, p. 330 ff.

实患有癌症。

那么本书查出华夏文明究竟患有什么癌症？如何医治？

侦察癌症所在，本侦探有办法。至于如何医治，就有待华夏儿女群策群力了。准此，本侦探决定采取“文明交战”作为本书的主旋律，向全世界的华裔提供一些参考的线索，幸勿嫌弃。

从理论回归到技术的问题：构思文明交战作为本书的主旋律之后，再接下来的任务是按照此主旋律，三番五次地大修全稿：凡是符合此主旋律的各章，就精益求精；不符合者，就割爱。例如，类似长篇侦探小说般的拙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①，则无论怎样浓缩，也无法达到短小精悍的标准，只好割爱。若读者诸君觉得收进本书的各个历史侦探故事过于短小，读来不够过瘾，则请详阅上述各书，如此即可观全豹。

至于每章所含的独立故事，则力求内容完整。这样做的副作用是各章难免有少量重复之处。权衡两害取其轻：少量“内容重复”总要比“衣冠不整”的害处要轻；故采少量重复，容本侦探郑重敬请读者见谅。其中第二十六章到第六十五章阐述、分析孙中山从童年到壮年“如何”“为何”走上革命道路，最终导向辛亥革命，故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建议本书副标题为“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本侦探欣然接受。他们又认为该等章目频频使用“成龙”一词，迹近“八卦”。但是，为了引起学术圈子以外广大读者的兴趣，“八卦”可能成为强项，故坚持己见。君不见，台湾出版界的朋友们虽然认为《历史侦探》这书名太“八卦”，建议改为《孙中山》；但对众多章目用上“成龙”一词，却无异议。可能他们是希望用“正经”的书名引起严谨学者的注意，又用“八卦”的章

^① 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目来引起广大读者对《历史侦探》的兴趣，如此就两存其美了。

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为何要引起学术圈子以外的广大读者的兴趣？要达到经世致用之目标，研究成果必须普及。

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容本侦探在此预告读者诸君。孙中山的乳名叫“帝象”——象其出生地翠亨村北帝庙的北帝，非象皇帝。^①“孙文”这个名字是他童年入读翠亨村村塾时，老师给他起的。他在1884年领洗成为基督徒时取名“日新”，取自《大学·释新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而“日新”用广东话音译为英语时是Yat Sen，因此与洋人交往时则一律采孙逸仙（Sun Yat Sen）。至于“孙中山”这个名字，则最初是由于1897年秋他到了日本之后化名为中山樵，事缘日本人平山周回忆他与孙中山在日本最初交往的片段时说：“总理来京曰：‘昨夜熟虑，欲且留日本。’即同车访犬养，归途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掌柜不知总理为中国人，出宿泊帖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源于此。”^②后来章士钊将“中山樵”改为“孙中山”，说：“时先生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始也广众话言，继而连章记载，大抵如此称谓，自信不疑。顷之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

①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三章第二节。

② 据《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1933年油印本）。该文是平山周在“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全文收录在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再版）。后来又转录于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528—529。

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形，终无与易。”^① 鉴于孙中山本人从来不自称“孙中山”，而且他在一切汉语公文以及书信上皆用“孙文”之名签署，故本侦探在本书适当的地方，仍会采“孙文”之名。

本侦探热切期待，中国大陆和台湾一家亲，千万别自相残杀。否则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华夏文明的第二场“文明交战”中，“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哪怕本侦探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且已经是风烛残年，仍然试图为了实践此热切期待而稍尽绵力。象征性的办法是争取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在2016年差不多同步出版本书，借此庆祝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团结标志——孙中山先生——150冥寿（以实龄计算）。经过一番努力，带病亲自奔跑于澳大利亚、香港、广州和台北之间联系，终于梦想成真：承当地高瞻远瞩的三家出版社不弃，先后接受拙稿，并按照各自的客观情况例如读者的爱好，为本书取名如下：

大陆版取名《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台湾版取名《孙中山：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香港版取名《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原定名）。

本侦探快慰之余，频频从病榻中挣扎起来，按照本书三种新名字的不同要求，统一增写了数章。但由于大陆和台湾的书名有所改动，再逐一恭请书法家题词已来不及。情急之下，迫得借用穗友的笔墨纸砚，亲自提笔重写书名。本侦探谈不上是任何意义的书法家，而且50多年来没有练字，所写不成气候，但依稀能代表本人的性格与当时复杂的情绪。

为何情绪突然变得复杂？刚买到一位先生为蓝诗玲博士（Dr. Julia Lovell）翻译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看本书题为“孙中山是

^① 见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1982），第1集，页217—304；其中页243。

名夜夜弦歌的花花公子？”和题为“枪毙孙文！”的这两章，可知大概。阅读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更会一目了然。

本书香港版定稿前的2015年12月，承刚到本校历史系当博士研究生的衣慎思同学帮忙，找出一些错字；部分初排稿亦承其帮忙校正，特致谢意。

哪怕在本书的香港中华书局版已经开始印刷的2016年2月5日，本侦探仍远飞英国，探讨本书几个未完的议题。其一是本书曾提到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外交部拒绝支持孙中山的新生政权，反而表态支持袁世凯。历史学家对此事的解释是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能稳定全局，英国人可以安心地继续在神州大地发财。但窃以为袁世凯之强大只是表面现象，英国外交部的决定，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若有的话，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从本侦探研究及撰写拙稿《文明交战》当中、题为“微观探索帝国主义性质”的一卷（即英文原著《鸩梦》）可见，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精英，深谋远虑，做事沉实，不会轻易被表面现象迷惑的，否则不可能建立起全球性的“日不落”大帝国。故窃以为在支持袁世凯而不支持孙中山这个问题上，英国当局会尽力找寻华夏文明深层次的矛盾。这个深层次的矛盾是什么？在英国同门师弟师妹协助下，不枉此行，终于增写了题为“一举成名天下知——孙中山在何处举行首次记者会？”和“孙中山如何、为何被‘册封’为国父？”的两章。

又哪怕本书的香港中华书局版已经在2016年2月18日正式出版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三人编辑团队仍然辛勤地编辑，并在纸稿上标出错字，写下他们的修改建议。双方议定，2016年3月7日开始，周惊涛编辑到本侦探下榻的中山大学紫荆园，与本侦探并肩作战。结果在7日星期一（09:00—12:00，14:00—16:00，17:30—18:30）共6个小时；3月8日星期二（09:00—12:30，14:00—15:30）共5个小时；3月9日星期三（08:30—13:00）共4个半小时——总共15个半小时，把该团队在纸稿

上标出的错字全部在本侦探的电子档上改正。由于是并肩作战，一人操作，另一人复核，故效率极高，也减少在操作期间出现新的错误。

2016年3月9日星期三下午和晚上，本侦探独力把香港中华书局在发印后蓝纸上的正误，在本侦探的电子档上改正。准此，改正错字的工程全部竣工。由此可知编辑工作是非常费时而又艰巨的，不同的人会找出不同的错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也会找出不同的错字。谨对曾经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众编辑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2016年3月15日星期二，本侦探为本书做最后定稿，承紫荆园技术员王添荣先生帮忙刻录光盘交广东人民出版社，特致谢忱，并恭候读者赐正。

黄宇和 谨识

2016年3月15日

二十三稿（定稿）于广州市中山大学紫荆园旅寓书房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言：当不成侦探者不配治史	1
第二章 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论	8
第三章 林则徐乃制毒巨擘？	17
第四章 鸦片有益论	27
第五章 鸦片战争期间中英秘密武器	37
第六章 巴麦尊子爵姓巴麦尊，名字的英文字母缩写是 H. J. T. ...	46
第七章 论三元里抗英乃民间“仇外狂”	55
第八章 论三元里抗英乃官府“仇外狂”	61
第九章 伪造圣旨龙颜大悦论	67
第十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文专著为何欠奉	73
第十一章 1856 年 10 月 8 日英国人指责广州人侮辱其国旗	79
第十二章 中国船受英国国旗保护之谜	89
第十三章 检视 1857 年 1 月 15 日的香港毒面包案	101
第十四章 生牛排和生洋葱妙用无穷	108
第十五章 捏造“六不”总督顺口溜的始作俑者	115
第十六章 捏造“六不”总督顺口溜的幕后主谋	125
第十七章 中外合谋诬蔑皇上的钦差大臣	132
第十八章 通番卖国的边防大员	140
第十九章 还叶名琛个清白	149
第二十章 叶名琛等被俘时之表现	157